

# 西藏牧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发展及围栏运动

肯尼斯·鲍尔

**内容提要：**文章旨在讨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牧区发展政策的实施情况。文章分析了为什么某种干预措施——尤其是围栏——被采用的原因。在这篇文章里，关于改革地区的市场、技术、土壤退化和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报道说辞与现实情况，被放在生物、历史和文化的视角下透视。文章也考虑了围栏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及潜在的后果，而且，在此趋势的基础上，预测了西藏自治区牧区未来发展的轨道。

## 导言：中国的经济改革走进西藏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发起的很多政策和政治运动一样，这项由邓小平设计的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走进西藏自治区的时间也比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党总书记胡耀邦曾率领一支高水平的“工作组”考察西藏的情况。令人意外的是，西藏的发展情况与印象大相径庭，胡因此尖锐的批评了党的所作所为。这次考察的考察报告谴责了中国自己在西藏地区的统治，视同为殖民主义，并督促立即发放救济措施和物资，促进当地发展。(沙克娅 1999)。<sup>1</sup>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自治区发起了一项被人们所知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除其它事项外，这项政策包含了赦免农民、牧民的税务，撤离大量的汉族管理干部，以及恢复了藏族人民的高等教育(戴姆伯格 2000)。这些改革是许多重大变革的开始，并在公社解散及集体财产（例如家畜）私有化运动中达到了高潮。

政府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存在焦虑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这不仅仅在西藏。<sup>2</sup> 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私有化改革险些让共产党失去了它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一些观察家认为，1978 年以后，公社私有化的广度和速度背离了党的最初或完全控制非集体所有制的理念 (cf. 克罗尔 1994, 耶普 1998, 大井 1999)。相反，这些观点认为，这项宣称为改革的运动与当时中国农民已经取得的领先地位背道而驰。

然而，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进程和方向上，西藏比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控制得更严格。当公社财产的非正式私有化进程正在人民共和国的其它地区顺利进行时，西藏自治区的公社仍然保存完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戈德斯坦和比尔，1991)。但是，改革一开始，西藏的政府机构迅速采取了从北京传来的宣传和政策，配合着藏族干部尽职地宣传邓小平的

改革诺言和“致富光荣”等口号。这些想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济学假设上，那就是如果市场潜力被打开了，并且将科学现代化引进传统实践，那么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将获得增长。在本文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些改革是如何在西藏的乡镇牧区实施的。<sup>3</sup>

### 此项研究的田野点

这项研究是 2002 年至 2004 年间在西藏自治区展开的。这篇论文里的大部分论据都摘自于经翻译后的政府文献和在博朗镇的采访(聂拉木县，日喀则地区)。这个小镇位于中国与尼泊尔交界地区喜马拉雅山的北部；世界第四高峰希夏邦玛峰 (8,013 米)从其边界流下的池水融入到佩枯错湖中 (北纬: 28° 21', 东经: 85° 47')。小镇位于珠穆琅玛峰保护地区的缓冲带，通向岗仁波齐峰南部的公路穿过该区域。根据聂拉木县的文献记载 (聂拉木县 2003), 博朗镇的平均海拔在 4,300-4,600 m, 平均气温在 0.70 °C, 年均降水量为 200 -236 mm。博朗镇是聂拉木县最大的畜牧业生产区，占该县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当地干部在 2003 年报告中统计的牲畜总数是 54,065 头(6,643 头牦牛和牛; 37,789 只绵羊; 9,157 只山羊; 476 匹马)。博朗镇有 9 个行政村，住着大约 380 户人家，2,000 多人口，人均收入 228 美元 (数据同样出自 2003 报告)。

除了在博朗镇，本研究在那曲和拉萨的牧区，拉萨、日喀则和聂拉木的市区都进行了采访。

### 改革的时代来到牧区西藏

据知情的博朗镇村民，1981 年，聂拉木县召开了一个由所有公社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宣布了实行私有化建议。参会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份文件，文件指出博朗镇将在私有化和继续集体所有制之间作出选择。领导们回到了各自的公社，向村民表明了他们的意见。毫不奇怪，这些牧民决定走私有化道路。有一位村长这样讲述：

“在实行公社的年代，懒人是享福的。领导们不知道怎么去激励他们。总之，生活不是很好。我们并不幸福。在实行公社的第一年，我们是有一个好收成。但是几年下来，人们不再去完成生产任务了。生产好手没有了激励，产量也下滑了。人们不再负责任，他们不在乎。连领导们也不那么在乎了。集体财产——如麻绳和大麦口袋——不断的丢失或被偷。我们村越来越穷。后来我们打破了“铁饭碗”，那样做很好。<sup>4</sup> 如果不那样做，我们还会失去我们所有的牲畜。私有化以后，事情有了改观。人们负起了责任，生产都很卖力气。”

但是私有化的宣布并没有保证它能即时地实施。1981 年宣布改革之后，有一些村领导从博朗到县政府去讨声援，请求重新拆分他们的生产队和重新分配家畜。但他们的请求被阻

挡了，并且仅允许一个生产队这样做。之所以有这样的拖延，也许应该归因于当初政府在实际实施牲畜的私有化过程中所遇到过的一些初始性问题。起初，私有化政策被描述成了一个‘借贷系统’。它留下了一个模糊概念：这些牲畜贷款将持续多长时间：结果是许多牲畜被牧民们迅速宰杀了。最终是召开了一个全县大会——从此家畜归家庭所有。一位公社领导回忆了当年一位政府官员的话：

“以前，我们是把牲畜借给你们。现在我们是把牲畜给你们。我们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这一政策不变。”

自此之后，“完全责任”系统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废除公社和牲畜的私有化对其在西藏牧区经济的管理实行了广泛的改革。牲畜按每户家庭的人口数被重新分配（例如，婴儿、儿童和老人享受与壮年人同样的分配待遇）。实际执行家畜分配的是村长和县级人民警察——通过这两个传统意义上象征“当局”和“政府武装力量”的标志，实现了这一对有趣组合的合法化。当地报道说这次对家畜的分配是被公社成员严格监督的，并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伴随着这些运动，公社的生产组和生产大队被拆散和重组为更小的单位，更好的匹配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人们组织生产活动时所采用的人员规模。之前的三个行政级别——公社、生产大队、生产组——被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所替代（何 2000，2001）。<sup>5</sup>

### **“致富光荣”：推动更高生产力和市场专业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聂拉木县政府出版的一些文献描述了改革以后的情形。这些文献将在随后谈论。

在改革时期，政府实现大众教育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大量的给村级干部发放手册；反过来，这些干部在指导下给村民们开会，宣读这些教导手册。为了方便回顾历史和拍摄，一位高级官员就给了笔者这样一本手册，1984 年出版。这本题为《聂拉木县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的小册子，随后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这本小册子记叙了聂拉木县各个不同乡镇的事迹：一些人走私有化道路，最后取得成功的故事。每篇文章都举了一些农户的例子，这些农户被在引进了先进技术后，都实现了产量上和收入上的巨大提高。一些文章的标题就能说明其文章的主旨：

- 德拉木镇通过经济多元化走上致富道路
- 朔巴冈村民是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帮助家畜增产实现快速致富的
- 常林乡实现 3 倍增产
- 共产党的致富政策给 Dragpa 大叔家插上了金翅膀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正在头疼如何强调它的先锋地位，所以这些文章一直在谋求给人们加深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人民铺就更好的生活道路。但是，这种说法准确么？共产党政府是否真的带领西藏牧民实现了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文章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比较出自改革以来，政府的官方修辞与牧区乡镇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在这些文章中，有一段比较详尽的摘引，能够给读者一个直观感受，能够发现政府关于西藏牧区都有哪些言论。

### “朔巴冈村民是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帮助家畜增产实现快速致富的”

群众的主动性是空前高涨的，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共产党提供的灵活政策，即“家庭承包责任制”中去。一旦有了这种主动性，每个人都有可能创造经济效益，确确实实地走上致富道路。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提高牧区产量，人是最关键的因素。现在人们用上了好饲料并且开始走上了经商之路……因为人们把重点放在进行科学养殖上，收入与去年相比，涨幅达73.7%。“家庭承包责任制”正在得到完善，牲畜养殖中也使用了科技，人们的知识水平也在提高。将来，这个村的人民将变得富裕起来。

正如这篇引文中描述的，生产积极性和辛勤的劳动是这些文章中的基本要素：例如，在改革后的中国，一个典范式的农民，会进行养鸡、养鸭或养猪的副业，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后。这些市场是改革后得到迅速发展（或再次出现）。但是在西藏牧区会是什么样呢？这样的副业可行么？是否在经济改革之后市场有了发展？甚至，是否在西藏牧区有市场存在？

当然，西藏的人口在过去50年有了增长（Gruschke, 1997, Fischer, 2005）。但是，在农村地区，增长的人口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市场商机。实际上，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家庭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对畜牧产品需求的增长。但是，这些市场只对那些有运输工具、住在市中心附近、并且有所必需的商品集散网络的牧民才能够到达这些市场。但是，西藏城镇间的运输网络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军事需要和安全需要，其次才是市中心交通的需要（例如那曲、拉萨、日喀则地区），而不是考虑将小村庄互相联接起来（Karan 1981, Bauer 2004）。

虽然私有化运动的目的是在畜牧业市场中引入竞争，但是一小部分的垄断者却控制着西藏主要的市中心的市場。例如，在西藏自治区的两个最大的城市（拉萨和日喀则），肉类市场是由从甘肃省和四川省来的讲汉语的穆斯林商人运作的——这对讲藏语的人和在经济上被边缘化地想在城镇市场销售商品的牧民来说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反过来，本地市场的运行状态就像是那些大城镇的卫星。例如，从当雄县来的藏民（拉萨市）就控制着临近的那曲市

的肉类市场(Richard2005)。就像这样，人们所期望的改革后市场扩大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完全惠及到广大的西藏牧民。

政府和国际化非政府组织(INGO)的规划者同样也提出，将专业化作为发展现代化畜牧业生产的一个手段。例如，开司米——西藏山羊产的西羊毛——就具有专业化产品的前景。<sup>6</sup> 但是这些高价值产品的加工中心和销售网络却由非藏族的商人控制着，并且收益在向西藏外流走而不是流进农村牧区 (Fischer 2005)。政府也希望农村居民能从其他经营活动和副产品上获得更多收益。在像聂拉木这样的农村，一些商人的确能从事像白银或茶叶、服装、包装食品、保温瓶这样的高价值产品的贸易。然而，这样的专业贸易也被相对少量的商人主宰着，并且缺乏启动资金也是一个主要的局限因素。

发展收入的非常规性来源，也作为发展西藏牧区经济的一项手段被提出。其论点就是，草场外就业能够解决牧民们面对的缺乏资金的问题，并且促进消费。在 2004 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主任估计，西藏牧民的人均收入将达到 224 美元，比前些年增长 22% (TIN 2004)。但是这些政府的说法能否在牧民群体中得到证实么？

在他们每年的工作指导方针中，聂拉木县的官员们被明确指示，要将促进就业作为增加牧民收入的一个途径。一位镇领导说，在他管辖下的至少九个村中，每年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外出打工。事实上，任何走过高原公路的人都能证实，在夏季的时候，会有大批的藏族人被雇佣，去修建和重建高海拔的交通网络。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比如填坑或搬运石块，是这些修路工人主要的工作内容，酬金是每天 2-3 美元。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即使是这样的草场外就业机会，能否取得它还要看交通是否通畅。

毋庸置疑，这些零散的西藏公路的筑路工人的数量，远远少于正在修建从青海省到西藏自治区的世界上最高海拔铁路的工人数量。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副部长反映，在 25000 名修建铁路的移民劳动力中，仅有 700 人是藏民( McDonald 2002)。政府官员称，这条铁路将填补那些与世隔绝的西部省份与中国东部发达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鸿沟，这些东部城市的港口是通往出口市场的通道。但是这条铁路只能到达拉萨市，还有一条狭窄的北部走廊穿过那曲地区。生活在铁路附近的游牧商人，可以从与中国大陆增多的联系中获益——例如，销售肉类或其它畜牧产品给铁路乘客。然而，如果其它的发展趋势成立，这种增多的联系将导致从青海、甘肃和云南来的非藏族移民人口的增加。这些从高人口密度、高竞争力地区移民来的经济移民，将会垄断由这条“天堂之路”带来的贸易和就业机会。

可以说，目前不对称的经济政治结构将继续影响那些没文化、不会说汉语和贫穷的西藏人(Fischer 2005)。而且，对那些生活在主要铁路走廊之外的牧民来说，许诺中的市场将依

然遥不可及。另外，高收入、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只有那些有职业技能的工人才能找得到，而牧民们很少有这些职业技能。西藏自治区职业学校的缺乏，是农村藏民发展职业技能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一直被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关注。一位有文化的僧侣说：“村里人没有足够的技能去到城里工作。我们中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讲一点汉语”。

由于家畜市场发展缓慢，且对大多数藏族牧民来说草场外就业机会依然有限，使得农村中的资金严重短缺。据一名藏族的非政府组织雇员说，普通的企业和厂商的商业贷款利率很高；最好是通过信贷，但是政府的信贷计划是有限的。伴随着改革，政府补贴削减，燃油费用的上涨，进一步限制了本地市场的发展。同时，畜牧产品的价格没有随着兽药和运输费用的上涨而上涨。

总之，像政府出版物里所描绘的，通过解放市场潜力带来效益的美好图景，不太符合大多数西藏牧民的实际情况。他们依然在按照旧有的方式进行生产，尤其是在技术、牧群结构、屠宰操作等方面。目前，西藏游牧人对土地使用和放牧的决策，正朝着增加稳定性，减小自然和经济风险，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Edstrom1993, Roe 等人 1998)。有趣的事，研究者发现，美国的牧牧场主同样也在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Rowe 等人 2001, Torell 等人 2001, Walker 和 Janssen2002)。

### 现代性的止痛药：应用科学使我们摆脱“土壤退化”

20 世纪 80 年代，对政府为西藏牧民提供市场这一主张一直存在着上述争议。但是让我们回到私有制的文章中，来看看政府是怎么样提议帮助改革时代的游牧民致富的。除了勤劳和无畏，促进增产的关键投入就是科学。为中国政府产生和服务的牧场文学的样本表明，科学被描述为西藏畜牧业萎靡不振的灵丹妙药。

在使用科学方法后的一些年中，村庄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使用科学方法来养殖家畜，他们有能力变得富有。因此他们已经摆脱了贫困。而在此之前，人们并不懂得如何去养殖家畜，他们都只是虐待动物。之前，他们经常毫无计划，并且在完全没有数量限制的情况下，将所有牲畜放在一个畜牧区之前，他们所考虑的就只是数量而已。他们并不关心质量。他们只考虑生存，即使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现在他们使用一种放牧动物的科学体系。动物的数量、质量、后代死亡率——这些都因为他们使用科学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聂拉姆县，1984)

面对恶劣的气候，短暂的生产季节以及高海拔，西藏牧民已经有着千年的使用牧场的经验，然而这并不能掩盖现有的生产系统的效率不高这一状况。土壤退化是政府官员和国际组

织的“专家”们探讨西藏草场的主导框架。<sup>7</sup> 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工作者们，都采用了一种通用的全球化的框架来思考西藏牧民，其中家畜数量过高是“不合逻辑”和“落后”做法的结果。一位畜牧局的政府高级专家这样描述牧民的状况：

主要的问题是人口和动物的数量。因为西藏特殊的情况，没有对它进行生育控制。因此游牧民们可以拥有 9 个孩子。在一个家庭已经拥有 500 只羊之前，现在居住着更多的孩子并且每个孩子需要 200 只羊。因此现在我们的羊更多了。在解放前（1951），西藏有大约 5 百万家畜，现在有 5 千万了。

在这样的描述下，可以想象牧场用户正在经历着“公地的悲剧”。在这里，牧场的土壤退化是人为的，是由不健全的制度安排和错误的文化习俗导致的。根据这些争议，传统的放牧系统是不科学并且是不可持续的。无知的牧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描述强化了这一观点。

在这种环境问题中，关于土壤退化的话语阐明了科学建构知识的力量<sup>8</sup>。以政府政策和“专家”报告、会议呈现、官方发言和官僚法规这样的方式传播的这些话，将会继续将国家表现为有力的、有效和善意的。在吹捧科学所带来的改进时，政府的干预得到加强。辩证的稻草人——传统的游牧民——站在了现代化科学的对立面。科学是对落后的历史性禁止。这意味着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对畜牧业进行“现代化”。

牧场退化被描述为一种技术和体制问题，政府应该为此提供解决方案。根据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INGO 的观点，为了将青藏高原转变为“繁荣的现代畜牧业基地”（Gelek, 1998），“合理”和“科学的”规划，将克服牧民的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牧场退化的生产模式。牧区需要大量的行政控制来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这也一直都是一致的政治信息。通过科学语言和推理，政府计划者使用土地退化作为借口来实施技术修复，这会导致社会控制的增加：这样的西藏政治体的草图符合福柯著名的概念“治理性”。（ Foucault 1972, Foucault 1980； 同样见 Yeh 关于该问题的绿色治理性的观点）

政府文件对“草原建设”需求的描述，好像草、土壤和水能够机械地混合在一起，而后进行简单的塑造就能变成草场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对中国土壤退化的一些假定：首先，土地退化的知识是客观测量的；其次，目前政府可以通过指责他人，而名正言顺地转移危机的罪责；再次，牧场圈地政策将会挽救草原。科学声明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即使我们没有听到是以何种方法得出结论的，包括那些潜在的估计缺陷。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的庄重或严肃，由量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所赋予的合法性意义，很少提供关于土壤退化的清晰的定义或者阐明一些牧场正在退化的原因。

并且对于引起退化的原因也有其他假设——假定退化确实会影响到西藏自治区的牧场。中亚地区的案例研究表明，牧场退化与牧场系统丧失机动性之间存在着相关（Williams 1996 和 2002, Humphrey 和 Sneath 1999, Wang 和 Wang 1999, Sneath 2000 以及 2002）。在封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时期，大的拥有牧群的机构促进了放牧活动（Sneath, 2000）。去共有化的效应之一是降低了由牧民家庭所开展的放牧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游牧牧民或多或少变得具有流动性。一方面，个体（尤其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改革年代，因为通过公路、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获得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生产率的下降，西藏人正逐渐被边缘化，无法有效参与经济，只能在农村地区受苦（Fischer 2005）。

Clarke (1986 和 1987)认为，在环城市地区、资源开采点周边和主要发展区域，西藏草地的退化更为严重。举例来说，西藏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空间模式，使市场离公路更近，因此使得放牧集中了在这些路边。生产和服务从这些结点进出，营造了本地的环境压力，这也可能最终破坏畜牧业的环境可行性。因此，在冬季放牧区的西藏牧民的永久定居，可能会降低以前的放牧轨道，即使是在家畜的季节性移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前中国政府政策基于草原资源被正在被浪费这一观点。要对这种情况进行改进则需要制度变迁，尤其是以私有化为方向的土地改革。防止退化和加强畜牧生产的假定方式，旨在加强“草原承包制”，而这会对牧场进行私有化并且分配地块到农户。从理论上讲，这种承包制的实施分三个阶段进行：（1）对镇和村庄的牧场界限的官方评估；（2）由县政府颁布牧场使用合同；（3）将牧场合同分配到单个家庭或者分配给行政村内的联合单位（Ho 2000）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已经尝试将整个中国牧区的广泛系统进行转换，以使其成为基于封闭牧场、灌溉饲草生产和提高育种的更加密集的生产体制（Clarke 1987, Williams 2002）。在西藏，通过栅栏进行圈地已经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广泛使用的手段。

### 推动西藏放牧和围栏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牧区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这种物质性的、社会性的以及象征性的领域划分的工具，这就是铁丝网栅栏。最开始使用是在内蒙古，之后仿照苏联的集体化，对饲料牧场的进行围栏。随后铁丝网栅栏开始进入宁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地区的牧区。在人民公社时期，栅栏外围开始在青海、甘肃和四川省的藏区出现。最早在西藏自治区出现的栅栏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拉萨以北的当雄河谷，由于其临近区域中心并且该处的牧



区可以被当做“模式”示范区。在 80 年代中期，冬季的栅栏和羊羔牧场迅速蔓延开来，此外，越来越多的夏季牧场也被栅栏圈了起来。事实上，中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对另外 1.5 亿亩（1000 万公顷）的牧区进行圈栏的目标（政府消息来源，Miller 于 2001 年引用）

基于一种经济逻辑，即假定人们如果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么他们会在管理、改善或者保存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于是栅栏被视为是在牧区最有效的发展干预。经济论点明显被用于对土地所有权政策进行合理化。政府政策制定者说，私有化将会激励使用者对改善管理进行投入，因为在社区公共草原上放牧的时候，个体缺乏激励机制（Miller 1998）。同样的，国际发展组织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私有化话语且推动着围场<sup>9</sup>。Ho（2000）认为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迎合了较大的自由企业的现代化框架，并且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也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

在西藏自治区，栅栏是最为常见，而且看上去也是最受欢迎的牧业发展模式。在这里使用的“模式”一词，因为栅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将线和铁柱串在一起的物体。Foucault（1972）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技术不是中性的，并且应该被认为与监控、控制和权力项目交织在一起。发展干预不仅仅是尝试为生产制约因素（cf. Salih 1990）提供技术解决策略。鉴于这种情况，栅栏可以被视为一种非政治性活动，表达这一文化中治理的性质和主导价值观。Razac（2002）认为，在美国西部的西部扩展历史以及铁丝网的使用表明，栅栏不仅给景观带来物理变化，也同样产生了我们必须思考的政治和社会结果。栅栏是一种标记边界和管理放牧的方式，但是它们也同样暗示了生产单元、社区、自然资源和治理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

Williams（2002）认为，围场构成了中国漫长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中央政府也正式通过它来尝试使牧民安定下来，从而更全面的控制国家外围的流动放牧人口。Smith（1996）以及 Gefu 和 Gilles（1990）等认为，圈地政策是从政治愿望出发，对游牧民族施加政治控制并同化他们。考虑到西藏牧区快速扩散的栅栏，对以上这些批评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有必要将现今西藏自治区的经验性实例与福柯式分析进行比较。这些理论是否能充分的捕捉或勾勒西藏自治区牧区内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动态？

### 围栏的意见：学术和国家

对围栏的批评忽略了铁丝网带来的益处。科学实验的结论是在受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在这里牲畜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如果多数牧民家庭开始围栏草原的话，这种尝试并不能被广泛的复制。如果控制好的话，围栏可以增加永久的作物生物量，而并不会必然增加牧场

的生产力，生产力取决于该地块的原始条件（Richard 2005）。在青藏高原的牧区，对生产力的首要控制因素更有可能是像积雪和可利用土壤水分这些因素（Klein 2003）。<sup>10</sup>

在中亚地区，由生存性的畜牧生产到市场驱动的放牧系统的转移，取决于对冬季牧场的生产力的控制和促进。在青藏高原的牧区，冬季牧场支持每年放牧的三分之二，但是却只占现有草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Ning 和 Zhaoli 2002）。像青藏高原这样的地区，冬季风暴就好比是牲畜数量控制的一种自然机制。为了在冰冷天气为牲畜提供更多饲料，鼓励对冬季牧场进行围栏和对从其他牧区向边缘牧场的草料投入进行补贴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会加速土壤退化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冬季的牧场——在那里会有更多的动物存活下来（Kerven 2004）。景观有更多的动物存活下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就是更强壮的或更高产的动物。相反的，这种效应可能使大量虚弱的动物生存下来，它们繁殖后代并提供劣质的产品。然而，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已经对西藏自治区的冬季牧场进行了大量的围栏补贴。

这些争议暂且不管，在我们对西藏自治区的国家计划干预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考虑围栏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批评者认为，栅栏是一种社会分化，并且加剧了那些穷牧民和富牧民之间的差距。举例来说，Yeh (2003a)和 TIN (1999)报告了西藏东部地区，在边界和栅栏的问题上社区冲突有所上升。来自青海——见证了大量在家庭层面对牧场进行分割的地区——的一位藏民这样说道：“只有当一个家庭贫穷支付不起的时候，你才不会看到栅栏。他人在这些家庭的牧区放牧。”另一位来自青藏高原东部的被采访者披露道：“栅栏可以在社区内或社区间增强资源利用的紧张局势。为了栅栏的边线而大打出手是非常常见的，并且偷窃时有发生——人们在晚上潜入到别人的牧场割草。”

有些地区的土地管理依赖的是家畜流动和资源使用的统一行动，他们指出栅栏可以成为这些社区内的一种分化力量，于是对围栏的批评提出了另一个社会问题。由围栏所导致的社会分化的另一个维度是在景观尺度上。一般来讲，纵横交错的小径、小溪和其它牧区团体的每位成员所需要的资源，这些异质景观被栅栏打破。尤其极其重要的资源水，在景观分割和使用栅栏的情况下，使用者却不能获取这一资源。

围栏被批评为是一种社会分化，加剧了阶级差别，并且最终是不起作用的。本文所要问的是：围栏是否作为一种计划政策来安定，从而更好的控制西藏自治区的游牧社区呢？或者，它是否是政府最快捷的方式，来为边远和偏远游牧社区的家畜生产力提供基础设施？不论存在怎样的争议，我们所遇见的大部分游牧民，当谈到目前的围栏需求，甚至对更多围栏存在需求时都十分激动。如果围栏真的存在这些社会和生态的弊病，为什么这些生计大部分依赖于可行的劳动安排和持续范围的生产力的西藏牧民，会需要更多的围栏呢？

## 围栏，国家政策和行政实践

因此，关于围栏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对于边缘的牧区团体，中国政府是个巨大的且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我们不能甘于接受这种解读，并停止争议。围栏已经或正在被设置的地方，牧民和乡镇一级的干部们对这种干预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怎么样讨论这种变革性技术的优缺点？基于对游牧民，还有在西藏和尼泊尔牧区的政府工作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顾问超过 10 年的访谈，我们认为，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西藏围栏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以下几点的结果：（1）对乡镇官员的奖励机构；（2）地方政府办事处要提高自身收益的这一紧要性；（3）牧民也积极从事发展装置，使用有回报的策略从政府手中获取物质利益。有关围栏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西藏地区各个地方政府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实施了圈地策略。一个小的值得现象就是西藏自治区和那些甘肃、云南、四川和青海的游牧社区在围栏模式上的差异（关于这一问题请见 Zhaoli 等人）。在这些省份中，围栏即使不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比较常见的。在大量工人的推动下，栅栏大多数情况下将道路和靠近行政中心的土地圈起来；更加偏远的地区保留对牧区的集体控制，并且相应地围栏出更大的空间单位（Richard 2005）。

同时，在西藏自治区内部，围栏要少见的多，大量的栅栏将公共地块圈定起来。此外，政府对西藏自治区外的西藏地区的围栏进行的补贴要少得多。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已经对围栏的成本进行补贴，并且只需要那些本地社区的成员来提供免费的劳动力，安装这些栅栏。如果其最大的牧区地区那曲县是一种迹象的话，那么西藏自治区的情况可能有所改变。对于那里的放牧人来说，围栏不再是免费的，并且当地人需要支付部分费用，甚至是大的项目，比如那些由扶贫办所支持的项目。

一个平行的例子更进一步的阐述了西藏地区政策实施的差别。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放牧区域的房子由私人资金所建造，没有政府补贴。这与西藏自治区有着明显的对比，那里人们能够得到补助，这样他们就能安定下来，并盖房子。毫不奇怪的是，中国的文件一直并且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政策是“特殊的”和“有特权的”。

这些区域在治理上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历史上看，像康巴和安多这样的地区，从它们与许多中国统治制度（最后是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来说，遵循与西藏中部和西部地区完全不同的轨迹。西藏东部地区对共产党政策的实施较早，且更为彻底和根本。更进一步来说，那里也有更多更密切的与汉族、回族和其它在甘肃、云南、四川和青海省的藏族居住区的少数民族商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互动。这些反过来比西藏自治区被更有系统地吸纳进土地使用权非牧区模型、经济生产和家庭结构中来。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

其降雨量比中部地区要充足，牧区的产量更多并且可能因此在索赔中产生更大的竞争；那里人口密度更大，这也推动了青藏高原东部家庭分地的围栏。正如在西藏自治区的自然村庄和乡镇一样，牧区由康巴和安多（四川和青海省）的干部分配到户，与公共单元相对，这一分配到户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牧区设置，尤其是在边境环境下，比如波龙，那里的年度降雨量不足 250mm，这样地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包括放牧劳动所实现的经济规模：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着，尤其是在放牧权市场缺失的情况下，促进此种措施的最低制度安排成本（Dalhman 1980, Stevenson 1991, Baland and Platteau 1998）

根据一位被安置的西藏人说，当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要改革的时候，关于草原的使用权有着很长时间的讨论。村级的代表们提出了将牧区分配给家庭的担心。换句话说也就是政府高层对潜在社会分化的担心，而这种分化可能是由牧区土地划分带来的。代表大会候选人毫无疑问的对西藏私有化意味着什么充满期待：一种困难的以及耗时的土地测绘活动，以及在较宽广范围内的土地上解决争端。看上去家庭和干部们，都继续在共用和维护资源，并在自然村一级的政府服务中获得既得利益（Croll 1994）。甚至是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尽管有将土地分配到个体农户的尝试，但 Banks 等人（2003）观察到集体和集团所有权安排仍在继续。因此，当土地在书面上分配到个体手中时，牧民继续使用公共的和委托公共实体监管的牧场。

另一个关键因素解释了在西藏自治区和其它牧区在实施中央政府策略上的差别，这就是时间安排。虽然在 1994 年通过第一个《西藏自治区草原法》，但是政府和地方知情人士都说，直到 2002 年的修订过后，这些草原管理法案才得以实施。重要的是，这些修订包含一个规定，不仅仅允许在家庭层面（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它方面一起），同样也允许在自然村或行政村层面上分配草原。接着，西藏自治区的大量游牧社区选择了村庄层面的牧场管理。

这里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些政策实施的时间滞后是否是故意的（也就是中央政府在有些动荡的少数民族地区谨慎行事），巧合的（无能的、滞后的管理）或是间接的（国家的弥漫性表现）或是出于政治目的（西藏人大正在有效地行使自治权）？或者是这几点之间的结合？

### 地面上的围栏

波龙乡的例子可以说明，围栏的生态、社会和政治动态是如何在地面上展现出来的。该游牧群体中最古老的围栏要追溯到 20 年前。这种较小的冬季饲料地块，由当地村民依靠政府资金架了起来。像其它放牧乡一样，在公社时期（1969-1980），波龙乡工作队的成员被

迫在牧区周围竖起了石头和草皮墙。这些墙今天已经摇摇欲坠并且不再去维护了。相反的是，如果有可能，栅栏却被经常修理以及扩张。差别在于技术和两种类型的圈地建造时的条款。栅栏运用了简单且牢固的技术，在短短几天内就能修好。如果有适当的设备（一台拖拉机，冷轧铁丝网和工具），那么数百公顷的土地可以很快就能被围栏好。相反的，石头和草皮墙必须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建造（维护的时间要短一些）。此外，收割草皮会将草原草地的根系破坏掉，使得土壤受到更多的侵蚀，对牧场造成大面积破坏。最后，公社时期的墙是在胁迫（也就是公社成员被要求去建造墙）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并且是在公社成员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是为了获取工分和口粮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产生的结果就是，随着草皮墙的坍塌，栅栏成倍增长。

在 2003 年到 2004 年间，超过 4000 公顷的牧场被波龙村民用从政府那里购买的栅栏圈了起来。显然，游牧民在 20 年里积极配合政府建造围场——这也揭示了一种与批评者所认为的圈栏是强制性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情形。然而，我们是否能从政府对铁丝网的倡导和资助中看到管辖和控制的议程呢？

在这里，对政府的更精细的分析表明，为什么只看见政府，却没看见个体出于其自身利益、自我保护和自我克制来行事——这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Scott (1985, 1998)和其他人 (Gellner 1983, Anderson 1991) 强调这些民族主义项目是如何利用现代性的符号——比如科技和消费——为公民构建一个民族身份和目的。本文则突出了西藏地区制定和实施牧区发展中中级和低级的参与者的重要性，国家叙述确实在发展政策和实践的过程中起着作用。举例来说，可以将美国所声称的“天赋使命”和西部地区的安置与中国的大跃进和其西部省份的发展进行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栅栏在对景观和土地管理的转变中起着显著作用。

我们的中国游牧发展模型必须能解释乡镇政府官员前进中的动机和约束。提出的第一个解释与栅栏背后的动力相关，与当地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存在着关联。基于量化的业绩指标，比如年度生产量的增加，官僚机构对官僚进行奖励 (Strathern, 2000)。聂拉木县畜牧局一位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乡领导干部的奖励系统：

我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呢？每年，乡领导都会提交他们的工作报告。我们阅读这些报告，看看是否有所增长。他们所生产的黄油和奶酪有多少呢？有多少动物幼崽？收入增加了多少？随后我们有个隆重的会议和宴会——在这里我们发布最好的业绩。我们为业绩最好的乡授予奖励（奖金）和大红色的横幅。

在这一政府官员地奖励系统中，他们的进展是由数量和安装好的围栏来衡量的。围栏很容易确定：你可以去测量有多少土地在特定的时间内被围栏；你可以在一财政年度购买、提

供和安装围栏。比如在波龙乡，超过 1300 公顷的土地在一周之内就被由社区成员所组成的志愿非专业工作队用栅栏圈起来了。

圈栏的结果由政府官员来量化，不仅考虑圈地的面积，同时也会考虑生物量产量的多少——政府支持的赞誉“科学”的思想意识的纯粹扩张。举例来说，一个乡镇文件（Nyelam 镇 2002）声称，为动物建造 241 间冬季庇护所将会导致以下动物健康和牧场生产力的效应：

每年（我们将会）将家畜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以上，这将会减少 1.2 亿的经济损失。（我们将会）避免失去三万立方米的草皮并且增加大约 316.5 千克的新鲜牧草。同时，牧场的规模也将增加并且生态环境也会得到保护。

这样的报告解释了一个量化的变量如何导致政府思维的可量化的结果。另一个适合这一激励机制的干预就是兽医服务。在地方政府的报告中，疫苗注射、生存下来的动物和出生的动物的数量被记录、被奖励。

同样在现实中，也有一些东西刺激着栅栏。一次性干预比疫苗接种需要较少的后续工作。举例来说，相对于其它发展干预（比如灌溉），围栏相比之下更容易实现，并且只需要当地村民和政府工作者付出较少的维护工作。有一小撮工人和一个拖拉机，栅栏就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立起来。安装也不需要太多的培训、技术或者工具——一小撮工人，还有当栅栏卷在栅栏排间拉长时提供杠杆作用和张力的一个拖拉机，以及其它一些简单的工具（钳子、钢丝钳、锤子等）

因此，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这一奖励机制鼓励像围栏这样的干预。甚至还鼓励政府官员，为他们的工作组找到产生收入的办法。这将西藏的干部们置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因为西藏自治区几乎完全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西藏超过九成的预算来自于该自治区的外部。然而，西藏领导干部们必须在当地司法管辖区内筹集资金来实施这些发展项目。

可以通过西藏自治区内的几个机构，尤其是扶贫办和商务部，筹集发展资金。因此，政府办公室需要向这些高一层的机构申请资金，用于减轻当地贫困程度的发展工作。一位聂拉木县的政府官员讲述了在他所管辖的乡镇内，是如何征求项目的：

西藏自治区给了我们计划和预算，之后县对所有的乡镇发了封信，让他们提交开发项目建议书。乡镇的官员之后就有责任来确保这些项目的完成。

考虑到发展干预的定量措施的内部系统（之前所讨论的），乡镇领导干部的趋势是做“局面”而不是“过程”方法（当然，在许多地方而不仅仅是中国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西藏领导干部申请的拨款通常是为了购买和建设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举例来说，波龙乡 2004 年

的工作计划只提出了两个主要资金干预措施：家畜庇护所的建立和冬季牧场的围栏，这说明了西藏放牧地区的发展倾向。

有时，围栏的资金来自一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单位在由中央政府所设置的分税制法案中被分配到“姊妹”省份，这一做法旨在缩小大陆蓬勃发展的省份和中国西部边缘停滞不前的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sup>11</sup> 因此，西藏自治区的县级单位可以向中国大陆的“姊妹”省份申请资金，后者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有种义务为其贫困的“手足”拨付资金<sup>12</sup>。有一年，日喀则地区的卫生局为波龙乡拨款 1 万元建设一个小的圈地。乡领导记得，“同一年，姊妹省份送给我们 4000 元在我们乡建设一个餐馆，我们将这些钱用来围栏了。”

所以，西藏自治区乡镇的收入来源既广泛又浅薄：一个乡可能向很多高一层机构申请发展资金，但是那些可以筹集资金的计划干预是很有限的。许多由北京拨给西藏的钱，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通过扶贫办的地区分支机构发放。其中有一些是省份对省份的合作关系所拨付的资金，旨在将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与贫困的内陆省份包括西藏自治区联系起来。

因此，尽管他们是在预算赤字地区工作，乡镇政府领导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就是申请资金并且用它们来买栅栏。根据一些扶贫办工作人员的访谈，在这些资金该如何使用这一层面上，很少有问责。毫不奇怪的是，由于财政和政治奖励，政府已经进入了制造栅栏这一业务中。那曲草原站就是一个例子，它生产和配送栅栏：明显是销售更多栅栏来筹集资金。

在改革之后以及监督机制较为薄弱的、财政遭遇缩减的环境中，西藏自治区针对实施发展的自上而下的补助金结构，为栅栏的使用和传播提供了一种激励，作为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一种方式。在西藏自治区，栅栏最终的价格可能比在源头的价格还要贵。根据聂拉木县的消息来源，为围栏的预留资金被政府的各层机构层层剥削。举例来说，自治区、地级和县级的扶贫办逐步提高在乡镇比如波龙乡圈栏所需材料的价格。换句话说，原始材料比如从工厂买进的铁丝网每米 4 元，当到乡镇的时候每米涨到了 7 元。这一价格仅仅反映出了栅栏本身的物质成本，还不包括运输成本。在他们详细的支出和收入的账簿中，乡镇财会人员的预算要比真实的围栏耗费要高；“围栏资金”中未动用的部分随后被报告为年底的“收入”。

运输花费，像原材料一样，当从西藏自治区的政府部门到达乡镇的时候就会增加。尽管我们可以假定，圈栏牧区越是靠近边远地区，托运成本将会随着距离的增长而增加。西藏自治区最远的县（阿里和那曲）的运输栅栏的真正经济花费，将解释这些偏远崎岖山镇的栅栏缺乏情况。除此之外，围栏的奖励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通常不被承认）就是个体从这一系统中所获取的利润。

## 游牧民支持圈栏吗？

本文到目前为止解释了为什么圈栏在西藏自治区可以得以传播的一些原因。不管技术（尤其是学者）被认为有怎样潜在的弊端，同样也有经验证据表明存在来自西藏游牧民的自下而上的力量。

一位拉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不相信游牧民对围栏的广泛需求。随后，她却要穿过西藏的北部平原——羌塘，那里一望无际，但视野中没有一个栅栏。需要在那边靠牲畜为主的社区计划一个发展项目，他问社区成员：“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他们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栅栏。

这种避免围栏是否是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成员所使用的参与式农村评估的一个手段呢？参与式农村评估作为一种收集信息的方法，因为其固有的偏见而备受诟病（Chambers 1994, Mosse 1994, Cooke and Kothari 2001）。发展——计划社会改变——不是一件中立的事情。就好像 Ferguson (1994), Escobar (1995)和其它人所认为的，发展可以延续现有的政治关系，并且将利益系统的倾斜向当权者一方。

因此，这些对栅栏的要求是不是一群农村农民的表现，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对发展机构的量表进行反应了呢？我们是否在观察一种“合理的策略”（见 Yeh 2003b），这被社区成员用来获取发展机构（现在，在一些地区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好处。在同政府干预进行多年的较量之后，他们要求栅栏是否是一种计算呢？他们是否简单的顺从另一个干预——就好像早些时期的公社和他们的集体化的牧群？这一悖论由在中国西藏地区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一位主管提出来。不管他自己对土地管理有什么疑虑，他承认西藏自治区的圈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事情：“但是这是许多年政策和压力的结果，人民没有其它选择。”

亦或是牧民们以一种策略方式重复政府话语，为了获取政府的好处？这就是说，与其向政府直接要求不切实际的援助，地方社区和乡镇领导干部之间达成了使用政府有限资源的一致意见？游牧民对围栏需求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代表了一些他们可以从政府所获取的具体利益。毫无疑问，围栏可以带来了一些立竿见影的而且长久的好处，包括较少牧羊人的劳动，防止冬季体质较弱的动物饿死，以及增加冬季资源。牧民们乐意为了围栏牧场，投入自身的资源，尤其是劳动。

牢记围栏不是一次性义务劳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护良好的栅栏表现出社群的承诺，表现了家庭对其效用的认识。在波龙乡和西藏自治区的其他牧区，那里栅栏将公共牧区圈定起来，至少每人都有相同的（如果使用不平等，由畜群规模决定）分享资源的机会。或许工



作机制与牧区的集体所有权相似，包括面对面放牧劳动的经济规模和维护：集体的围栏牧场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放牧权和草场市场缺失的情况下。

西藏地区牧民们对围栏的欢迎和需要，看上去可以掩盖我们在土地管理中所观察到的“虚假意”这种简单的假设。基于以上这些，我们如何解释围栏的基层膨胀呢？或许我们正在观察的是一种从众效应，创新的词语在崎岖的乡镇中迅速蔓延开来。或者也可能围栏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游牧社区的象征着发展的社会图腾？西藏人们当然不能幸免被现代事物所吸引：见证了像电视机、移动电话和摩托车等在草原上惊人的扩散。在中国，私有化可能是一个迅速扩散的概念，但是我不应该将西藏牧民对栅栏的需求，等同于对私有化、以及对高原草原的分配愿望。对于牧民来说，围栏是种创新，他们认为可以更可靠的帮助他们达到生活需要。是否是这样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 围栏是否是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一些中国和国际学者权衡了——并且毫无疑问的试图去建模和预测——世界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Miehe 1996, Liu 和 Zhang 1998, Miehe 和 Miehe 2000）。Dawn Chatty（2005）观察到：

所有的人都需要去控制和适应变化，而且有些人做的比别人要好。由于与土地和动物健康之间的特殊关系，牧民们对变化的感觉细致入微并且知道如何去控制和适应。

如果西藏的草地干涸，保护关键的季节性牧区将会是一个务实的适应方式。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将是牧民们维护其生活方式的最后一道防护。在生产系统基础的这种宏观尺度变化的背景下，西藏牧民们正在适应。他们用可以获取的有限的方式进行回应，这种方式就是栅栏。

围栏现象的另一种解释就是它是一种对边境消逝的反应——西藏开放空间的灭绝。当家庭和畜群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认为西藏人已经意识到资源的限制和对草原争夺的加剧。或许我们可以将美国投资者在 1929 年股市崩盘后冲向银行这一行为与牧民对草原进行圈地进行比较。Roy Behnke（1988）以苏丹为例，其中的一个农牧组，将钻孔周围的土地圈起来，用来灌溉干草，以便在干燥季节进行放牧（相当于中亚地区为冬季和产羔牧场圈定牧场干草）：

每个人都很恐慌，预计会发生土地短缺，并且为将来使用而圈定更多广阔的区域。但是同到银行挤兑一样，惊恐是可以自我实现的。那些没有对多余土地进行圈栏的人随后发现，

他们被他人的栅栏所包围了，他们已经无法扩展他们的农场了。没有人计划去圈地，居民说，圈地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是个体保护自身利益的意外结果。

栅栏的引力是否标志着财产关系，尤其是乡镇之间的财产关系，因为人口压力和行政的不公正划分而变得更具争议的时代已经来临？当标定新界限和裁定旧界限的时候，政府可以加剧社区之间这种长期的历史紧张。或者更简单的说，是否可以因为在西藏栅栏可以适应牧区生产，就说它起了作用了呢？

2003年的十月，我们在拉萨北部的当雄区遇到一群牧民。当时他们正以28户集体成员的身份收集干草，这种规模在过去的50年已经重组了多次。他们正在将他们所保护的冬季干草周围的栅栏除去。以前，牧民将动物从这块区域迁到其他草原上，而这些草原现在已经属于其他行政村了。他们解释道，随着人和动物的增加，他们必须要围栏来保护这些草地。

传统的资源利用边界继续受到积极的监测。但是因为这些边界与栅栏相比不太明显，它们同样也更有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争议和/或者协商。因此，圈栏的其中一个激励因素可能是它为边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不容置疑的标记，使牧场不具备谈判的可能性。将栅栏看做是对政府和其目前所废弃的共产化的一种反应，也可以是富有成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说牧民们充分利用围栏，将它作为控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再生产至关重要的资源的方式。

围栏在有些地方对生产的实践模式进行重组，而在其他地方，仅仅是对现有资源管理的社会模式进行正规化和合法化，在这两种用途进行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对一些牧区进行保护，以便实现秋季丰收，这种方式世代在西藏自治区采用。以前，牧区家庭们通过流动性和社会制裁等方式集体认领并且保护牧区，现在都在使用铁丝网了。栅栏随后成为将动物饲养在同一牧区的一种机械手段，而不是传统的在特定季节对家畜进行放养。

栅栏是地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物理和心理指标，我们或许可以看见旧形式所有权的新迭代。一位63岁的村长这样评价他看守的围栏区域：

这些地区都有旧名字，在以前禁止的时期，你是不能迈入这些区域的。之前这里没有圈栏，但是这些草地却受到了保护；如果有人的动物跨过我们的边界并且误入我们的（冬季）牧场，我们将会杀死他们的一只羊。随后我们将其内脏挂在边界上来警告他们，并且告知所有人这里是我们的土地。

因此，仔细考虑围栏是否确实产生了“地形变质的革命”是十分重要的，这革命指资源利用和景观特色的根本转变（Williams 2002）。在西藏自治区，被围栏围起来的牧区通常位于历史保护区内。游牧民想要继续守护这些区域，这是很常见的，并且他们热衷于使用节省劳力的放牧技术。

## 食羊肉者何去何从？

从这点来看，我们得到一种启发。我们将未来牧场管理问题放在人口、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尤其是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建设一条从西藏到青海的铁路（期望在 2005 年完成），从而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内陆地区联系到一起，以此来加速非西藏人的经济移民。正如我们从过去中所看见的，我们可以期望在西藏牧区使用的资源种类，将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和环境制约之间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影响。

### 致谢

非常感谢温纳格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这项研究的资金支持。作者也同样感谢西藏自治区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在实地考察中所提供的帮助。作者希望感谢 Carol Kerven，给本文的几次易稿提供的编辑建议

### 注释：

- 1 尽管目前对西藏地理/文化/政治的定义存在争议，本文使用西藏自治区一词。除非特别说明，本研究并不包含中国其它省份，比如青海，那里有着非常多的以藏语为母语的游牧人口。
2. 在中国内陆，对改革时代的描述有着大量的文献，包括满意的和不满意的。文献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就是对中国政府的性质进行描述。在毛泽东之后，如何开展治理呢？中国共产党如何去适应并且继续管理？Shue (1984), Chan 等(1984, 1992), Dassu 和 Saich (1992), Croll (1994)以及 Blecher 和 Shue (1996)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作了突出的介绍。对于改革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意义这一问题，涉及到一篇相关文献（见 Herberer 1989, Choeden 1992, Mackerass 1994 和 2003）。较少的作者研究了改革对土地管理，尤其是在牧区的影响。（见 Ho 2001, Sneath 2002, Williams 2002）。对于牧区藏民的改革时代的描述包括 Clarke (1987), Goldstein 和 Beall (1989, 1991, 1990, 2002), Levine (1999), Shakya (1999), Manderscheid (2001)等等。西藏的发展主题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 Karan (1976, 1981), Clarke (1986,1987), Forbes 和 McGranahan (1992), 以及 Yeh (2003b)。
- 3 西藏的牧场有 8000 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9%，是中国总草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中国有 260 个放牧县，共 3900 万人口，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区域。西藏有着 4 亿公顷的草原，

世界第三大，占其陆地面积的 40%。这些草原养活了世界上最大的绵羊和山羊群，以及世界第四大的牛群（Banks 2003: 717）。

- 4 “铁饭碗”是指共产党保证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生计，不管其工作表现还是对生产的贡献如何。
5. 这些是中国为县级以下的行政实体所设置的条款，“自然村”是政府下面最小的单元。
6. 在游牧区发展藏族特色产品的其它努力包括：（1）纽约利众基金会已经对青海省以个由和尚运营的奶酪工厂进行了大笔投资；（2）一些中国制造商正在生产一些牦牛肉干、牦牛酸奶用于销售；（3）西藏扶贫基金已经雇佣了一些国际顾问，帮助自治羊毛制品比如围巾、毛衣、毛毯等的设计。
7. 根据一些官方消息来源，中国大约九成的牧场在退化（援引自银行的中国政府来源，2003: 718），这些草场有大约 3 到 4 成处于“中度至严重的”退化之中。在 1989 年和 1997 年之间，退化牧场总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退化明显加速（援引自银行的中国政府来源，2003: 718）。Miller（2001:5）使用政府来源进行估计，西藏自治区大约 1200 万公顷（或者西藏总牧场面积的 15%）的牧场发生退化，并且给出精确数字，即 684,853 公顷的牧场严重退化。这一报告明确指出，那曲县问题最大，有 480 万公顷的土地退化，占西藏自治区退化牧场总面积的 40%。将西藏过度放牧和“公共地的悲剧”相联系的文献看参阅 Ellis (1992), Longworth 和 Williamson (1993), Tuoman (1993) 以及 Wang (1995)。
- 8 本文不会重复其它学者对科学“真理”的自然化假设的解构，以及科学知识如何被文化性的构建和调动，并用于政治目的（Nader 1996, Adams 2001, Fairhead 和 Leach 2003）。Williams（2002）认为，中国官员通过空间或是时间策略而将现有的环境退化的责任进行转移。空间导向策略将责任归咎于远离北京的当地土地使用者，他们经常被描绘成无知的、不理性的、落后的以及不合作的；而时间策略将责任归于先前政府制度。
- 9 与 Williams（2002）进行比较，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工作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所增加。1978 年，中国对这些国际援助张开了怀抱，在那时，政府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寻求技术援助。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国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时联合国发展机构支持的项目超过 200 个（Croll 1994）。同样的，工作在西藏自治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急剧扩张着，虽然他们的合作领域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控制，对项目的地理位置和西藏工作人员的聘用都有着很强的限制。

10. 自牧场科学家包括 Behnke 等, (1993), Ellis 等(1993), Westoby 等(1989)以及 Illius 和 O'Connor (1999)对承载能力的概念(根据计划者对生产力和放牧压力的计算,放养率是受到限制的)权衡,已经有 20 年的时间了。他们西方的操场科学忽略了放牧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因此在牧民居住的边缘草场环境中,过高的评估了放牧压力的影响。这些“非平衡”的理论家认为,气候,而不是人类,造成了放牧压力——控制的生物生产力。对半干旱草原的生态动力目前存在着争议,科学家们目前认为,气候和人类影响都可能在推动这种非平衡系统内的生产力。
11. Humphrey (1995) 指出前苏联也使用过相同的计划,苏联政府扮演着“地理平等主义”的再分配角色,并且富裕的、多产的苏联地区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
12. 类似这样的“姊妹”合作的例子有,先列举西藏行政单位,而后是内陆省份: Kongpo - Fuxien, Lhoka - 湖北, 拉萨-Jinju & 北京, Medrogonkhar -宁夏 阿里—陕西, 那曲—辽宁, Chamdo - 四川和重庆,日喀则—山东。

## 参考文献

- V. Adams 2001. 《科学的圣地:藏药中科学的不明确实践》,《文化人类学》, 16: 542-75。
- B. Anderson 1991. 《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和起源和扩散的反思》,左页,纽约。
- J.M.Baland 和 J.P.Platteau 1996, 《停止自然资源的退化:农村社区是否有作用?》,粮农组织和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
- T. Banks 2003, 《中国牧场的产权改革:走向家庭牧场的两难处境》,《发展和变化》, 32: 717-40
- T. Banks, C. Richard, P. Li 和 Z. Yan 2003, 《中国西部以社区为基础的草原管理:基本原理,试点项目的经验和政策含义》,《山地研究与发展》, 23: 132—40
- K.Bauer 2004, 《边境高地:多波和喜马拉雅牧民变化的世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
- R. Behnke 1988, 《索马里中部的草场圈地》,《畜牧业发展网络》,论文 25b (三月) 海外发展研究所,伦敦
- R. Behnke, I. Scoones 和 C.Kerven 编辑 1993, 《失衡的生态范围:非洲大草原的自然变异和畜牧业适应》,海外发展研究所,伦敦
- M. Blecher 和 V. Shue 1996, 《被拴住的鹿:一个中国乡镇的政府和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 K, Buffetrille, 和 H. Diemberger 编辑, 2000, 《国际藏学协会第九届研讨会会刊》, 布里尔, 莱顿
- R. Chambers 1994 《范式转变和参与式研究与发展的实践》, 发展研究所, 布莱顿
- A. Chang, R. Madsen 和 J. Unger 1984 《陈村: 毛泽东中国下的一个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 加州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
- A. Chang, R. Madsen 和 J. Unger 1992 《毛邓领导下的陈村》, 加州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
- D. Chatty 2005 电子邮件的个人通信 3月31日
- Y. Choedon 1992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涉及西藏的少数民族政策》, 《中亚地区的种族与政治》, 编辑: K.Warikoo 和 Dawa Norbu, 南亚出版社, 新德里, 87-203
- G. Clarke 1986, 《今日的西藏: 宣传, 记录和政策》, 《喜马拉雅研究公报》8(1): 32
- 1987 《中国对西藏的改革, 以及对畜牧业的影响》, 报告 237. 发展研究所, 苏塞克斯大学, 布莱顿
- G. Clarke 编辑 1998, 《西藏的发展, 社会和环境》, 奥地利科学院出版, 维也纳
- B. Cooke 和 U. Kothari 编辑 2001: 《参与: 新暴政?》, Zed 图书, 伦敦。
- E. Croll 1994: 《从天堂到地球: 中国发展的形象和经验》, Routledge 出版社, 伦敦。
- Carl. Dahlman 1980: 《开放领域系统及其他: 经济体制的产权分析》,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 M. Dassu 和 T. Saich 1992: 《中国改革的十年: 从希望到失望》, 科根·保罗国际, 伦敦
- H. Diemberger 2000: 《波龙的人民和领地概念》, 《国际藏学协会第九届研讨会会刊》, 编辑: K. Buffetrille 和 H. Diemberger, 33-55
- J. Edstrom 编辑, 1993: 《蒙古的家畜营销改革: 食品安全和公正的市场发展问题》, 《游牧民族》33: 137-52
- J. Ellis 编辑, 1992: 《中国北方的草原和草原科学》, 国家学术出版社, 华盛顿特区
- I.Ellis, M. Coughenour 和 D. Swift 1993: 《气候变化,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对草场和家畜发展的意义》, 《草原生态失衡: 自然变异的新模式和非洲大草原的畜牧业适应》, 编辑: R. Behnke, I. Scoones 和 C. Kerven, 海外发展研究所, 伦敦
- A. Escobar 1995: 《遭遇发展: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消失》,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 M. Fairhead 和 J. Leach 2003: 《科学, 社会和权利: 非洲西部和加勒比的环境知识和政策》,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 J. Ferguson 1994: 《反政治机器: 莱索托的“发展”, 非政治化和官僚主义》,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明尼阿波利斯
- A. Fischer 2005: 《西藏的地区成长和社会排斥》, 《最近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报告》, 47 卷。哥本哈根: 北欧亚洲研究所
- A. Forbes 和 C. McGranahan 1992: 《发展西藏? 国际发展项目的调查》, 《文化生存》, 剑桥, 马萨诸塞州, 美国
- M. Foucault 1972: 《知识的考古学》, 塔维斯托克, 伦敦
- 1980, 《权力和知识: 访谈和其它著作精选: 1972-1977》
- 哈维斯特, 布莱顿, J. Gem 和 J. Gilles 1990: 《尼日利亚和北美的牧民, 牧场主和政府: 比较研究》, 《游牧民族》, 25-27: 34—50
- L. Gelek 1998: 《青藏高原的畜牧业的发展》, 《西藏的发展, 社会和环境》, 编辑, G. Clarke, 奥地利科学院出版, 维也纳
- E. Gellner 1983: 《国家和民族主义》,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伊萨卡州, 美国纽约
- M. Goldstein 和 C. Beall 1989: 《中国的改革政策对西藏西部地区游牧民的影响》, 《亚洲调查》: 29: 619
- 1990: 《西藏西部的游牧民: 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存》, 加州大学出版社, 伯克利
- 1991: 《青藏高原的游牧畜牧业的变化和连续性》, 《游牧民族》, 28: 105-22
- 2002: 《西藏游牧畜牧业的变化规律》, 《牧民的人类生物学》, 编辑, W. Leonard 和 M. Crawford,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131-50
- A. Gruschke 1997: 《西藏的人口与民族志》, 《地理心理学评论报》 49: 279-86
- T. Herberer 1989: 《中国和其少数民族, 自治或同化?》, M. Armonk, E. Sharpe, 纽约
- P. Ho 2000: 《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冲突: 牧场法律的制定》, 《中国季刊》, 161: 227-50
- 2001: 《谁拥有中国的土地? 政策, 使用权和故意的模棱两可制度》, 《中国季刊》, 166: 394-421
- C. Humphrey 1995: 《剑桥大学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人类学特刊介绍》, 《剑桥人类学》, 18: 2-13
- C. Humphrey 和 D. Sneath 1999: 《游牧的结束? 亚洲内陆的社会, 政府和环境》, 杜克大学出版社,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 A. Illius 和 T. O'Connor 1999: 《干旱和半干旱放牧系统的非平衡概念的关联性》, 《生态应用》: 9(3): 798-813

- P. Karan 1976: 《西藏的不断变化: 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对景观的影响》, 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美国, 肯塔基州, 莱克星敦
- 1981: 《景观的意识形态: 西藏研究》, 西藏杂志, 6: 11-21
- C. Kerven 2004: 《低温和暴风雪对亚洲北部的牧场和家畜的影响》, 《平衡与非平衡的牧场》, 编辑: S. Vetter, 土地和农业研究计划, 南非, 西开普大学
- J.Klein 2003: 《气候变暖和牧场土地使用变化: 对青藏高原东北部牧场碳循环、生物多样性和质量的含义》, 博士论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W.Leonard 和 M.Crawford 编辑, 2002, 《牧民的人类生物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 N.Levine 1999: 《牛和现金经济: 中国四川的西藏游牧民对变化的反应》, 《人类组织》, 58: 161-72
- X.Liu 和 M. Zhang 1998: 《青藏高原的当代气候变化以及对温室效应的反应》, 《中国地理科学》, 8: 289-98
- J. Longworth 和 G. Williamson. 1993: 《中国的牧区: 羊和羊毛》, 《少数民族, 牧场退化和可持续发展》, CAB 国际与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英国, 沃林福德
- C. Mackerras 2003: 《中国少数民族和全球化》, Routledge Curzon, 伦敦
- 1994: 《中国的民族: 20 世纪的整合和现代化》,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 R. Mandel 和 C. Humphrey 编辑, 2002: 《游牧的没落和重现: 藏族牧民复兴了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和生产》, 《地理杂志》, 53: 173-82
- P. Masina 编辑 2002: 《对东亚发展的反思: 从虚幻的奇迹到经济危机》, Curzon 出版社, 英国, 萨利
- J.McDonald 2002: 《在铁路上“工作”: 中国扩建铁路来扶贫、统一国家》, 世界西藏新闻, 发行编号: 2002/12/30
- G.Miehe 1996: 《亚洲高地的植被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古地理学, 古气象学, 古生态学》, 120: 5-24
- G.Miehe 和 S.Miehe 2000: 《西藏牧场的环境变迁》, 《Marbuger 地理著作》, 135: 282—311
- D.Miller 1998: 《西藏畜牧业: 高原上的困难时期》, 藏学研究的互联网新闻, 西藏研究中心, 俄亥俄州, <http://www.cwru.edu/affil/tibet/papers/miller.htm>
- 2001: 《中国西部的贫困西藏游牧民: 贫穷的资料和降低贫穷的策略》, 西藏发展研讨会论文, 五月 4-6 日, 2001, 布兰代斯大学。  
<http://www.cwru.edu/affil/tibet/papers/miller2.htm>



- D.Mosse 1994: 《权威, 性别和知识: 参与式农村评估实践的理论思考》, 《发展和变化》, 25: 497-525
- L.Nader 1996: 科学新发现: 边界, 权利和知识的人类学研究, Routledge 出版社, 纽约。
- W.Ning 和 Y.Zhaoli 2002: 《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和社会的脆弱: 牧区改革的困境和道路》, 56: 2-14
- 聂拉木县, 1984: 《聂拉木县中国共产党领导大众从贫困走向繁荣》, 聂拉木出版的政府手册, 日喀则地区(中国)
- 聂拉木县畜牧局 2002: 《在波龙牧区建造冬季庇护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聂拉木县
- 2003: 波龙乡关于建造牲畜庇护所的申请, 11月28号
- J.Oi 1999: 《中国农村改革的20年: 概述和评估》, 《中国季刊》, 159: 616-28
- O.Razac 2002: 《铁丝: 政治历史》, 简介, 伦敦
- C.Richard 2005: 电子邮件的个人通信, 四月18号
- E.Roe, L.Huntsinger 和 K.Labnow 1998: 《高度可靠的畜牧业》, 《干旱环境杂志》, 39: 39-55
- H.Rowe, M.Shinderman 和 E.Bartlett 2001: 《牧场的变化》, 《牧场》, 23(2): 6-10
- M.Salih 1990: 《介绍: 对牧民的观点和非洲政府》, 《游牧民族》, 25-27: 3-6
- J.Scott 1985: 《弱者的武器: 农民抵抗的日常形式》, 耶鲁大学出版社, 纽黑文
- 1998: 《站在国家的角度去看: 某些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计划是怎样失败的》, 耶鲁大学出版社, 纽黑文
- T.Shakya 1999: 《雪地中的龙: 自1947年西藏近代历史》,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
- V.Shue 1984: 《公社的命运》, 《现代中国》, 10: 259-84
- W.Smith 1996: 《藏族: 藏族和汉藏关系史》, Westview 出版社, 科罗拉多州, 博尔德
- D.Sneath 2000: 《改变内蒙古: 牧民蒙古社会和中国政府》,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 2002: 《“市场时代”下的蒙古》, 牧场土地使用和发展话语》, 《市场和道德观念: 后社会主义民族志研究》, 编辑, R.Mandel 和 C.Humphrey, 牛津, 伯格, 191-210
- G.Stevenson 1991: 《公共财产经济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 M.Strathem 编辑, 2000: 《审计文化》, 《责任的人类学研究, 道德和研究院》, Routledge 出版社, 伦敦。
- 西藏信息网 1999: 《在游牧斗争中死亡的游牧民》, <http://www.tibetinfo.net/news-updates/nu210699.htm>, 六月21号。

-----2004: 《藏族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国》，[Fiew.www.chinaview.cn](http://www.chinaview.cn)，四月 14 日

L.A.Torell, N.Rimbey, J.Tanaka 和 S.Bailey 2001: 《大牧场利润驱动的缺乏: 对政策分析的启示》，发表在牧场管理学会的年度会议的论文，夏威夷，凯鲁瓦-科纳，2 月 17 号至 23 号 [http://www.publiclandsranching.org/htmlres/PDF/torell\\_lack\\_profit\\_motive.pdf](http://www.publiclandsranching.org/htmlres/PDF/torell_lack_profit_motive.pdf)

C.Tuoman 1993: 《新疆草原的现状，退化的原因和对策》，《新疆畜牧杂志》，2: 28-33

B.Walker 和 M.Janssen 2002: 《牧场，牧民和政府: 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系统》，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分会，《B 系列生物科学》，357(1421): 719-25

R.Wang 1995: 《加强管理的草原所有权的实践以及草场资源的建设》，《中国草原》，4: 47-51

S.Wang 和 Y.Wang 1999: 《内蒙古典型草原的退化机制》，《中国应用生态学报》，10: 437—41

K.Warikoo 和 D.Norbu 编辑，1992: 《中亚的种族与政治》，南亚出版社，新德里

M.Westoby, B.Walker 和 I.Noy-Meir 1989: 《对非平衡牧场的机会性管理》，《牧场管理杂志》，42: 266-74

D.M.Williams, 1996, 《中国的铁丝墙: 一个当代草原戏剧》，《亚洲研究杂志》，55: 665-91

-----2002: 《在长城之外: 中国内蒙古草原的环境、认同与发展》，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美国斯坦福

E.Yeh 2003a: 《西藏牧场的战争: 安多草原的空间政治和权威》，《发展和变化》，34(3): 499-523

-----2003b: 《驯服西藏景观: 中国发展和农业转变》，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 R.Yep 1998: 《改革时代中国的农村企业家和改变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博士论文，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

Ken Bauer 正在牛津大学发展研究所完成哲学博士论文。他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尼泊尔 Dolpo 做过研究，拥有草原管理的科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做过顾问，并且在喜马拉雅和中亚地区管理一个针对游牧民的非政府组织 ([www.drokpa.org](http://www.drokpa.org))。目前他正在帮助建立一个对西藏和喜马拉雅进行研究的门户网站 ([www.digitalhimalaya.com](http://www.digitalhimalaya.com))

电子邮件: [kenneth.bauer@linacre.ox.ac.uk](mailto:kenneth.bauer@linacre.ox.ac.uk)